

# 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李晓倩 吕孝礼 徐 浩 刘求实\*\*

**【摘 要】** 目前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验研究正在迅速崛起，而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验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本文对截至 2016 年底国外公共管理学术期刊发表的实验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为国内学者未来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供参考。本文所评述的文献来源于 21 本国外公共管理期刊中使用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方法的文章，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参与当前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作者、实验方法和实验设计、研究对象和被试等要素的分布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调查实验，最常用的实验设计是单因素设计和被试间设计，研究主要围绕公众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两个群体展开，参与实验研究的被试以公众和学生居多，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较少。最后，结合对当前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现状与趋势的分析，本文对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文献评述；文献计量

## 一 引言

实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比之下，实验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曲折。早在

---

\*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573153；71642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6301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7M610935）；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20151080360）。感谢匿名专家及中国人民大学马亮老师对本文的修改意见。

\*\* 李晓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吕孝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助理教授（通讯作者）；徐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生；刘求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益慈善研究院副教授。

1992年,《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就曾组织过实验研究的专栏(第3期和第4期)。在之后的20年中,公共管理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应用并无明显进展。直到2011年,马吉茨(Margetts)在《公共管理评论》(*Public Management Review*)一期研究方法的专刊里再次呼吁应用实验法。<sup>①</sup>随后佩里(Perry)于2012年在《公共管理评论》的一期主编评论中再次肯定了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价值,提出希望看到更多的实验研究。<sup>②</sup>

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开始逐渐重视实验方法的使用。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国际学术期刊开设了实验研究专栏,如《公共管理评论》和《国际公共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分别在2016年和2015年出版了实验研究专刊;《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关于实验研究的专刊也正在组织中;更有一些研究者主张开辟实验公共管理<sup>③</sup>或行为公共管理<sup>④</sup>相关研究方向。境外一些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开设了实验室。例如,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公共事务与治理学院成立了实验与行为公共管理中心;哈佛大学建立了决策科学实验室;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成立了“公共管理与政策实验室”,并建立了由1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的非正式交流网络“行为公共管理网络”(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sup>⑤</sup>

实务界也认识到行为规律对于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及实施的支撑作用,开始将行为研究引入政府实务工作。英国前首相卡梅隆于2010年成立了行为视角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BIT),后来在各部委均设置了与行为研究相关的职位。<sup>⑥</sup>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下面设立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SBST),鼓励各部门探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吸纳行为科学研究成果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并在加大对行为科学家的招聘力度的同时,加强与行为科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合作。此领域也逐步形成了一些国际学术网络,如EGAP(Evidence in Governance and Politics)是一个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休利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155名学者和实务人员共同创立的旨在通过采用实验的方法为解决政府治理、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严谨的实证依据的学术网络;它倡导通过实

① Margetts, H. Z., "Experiments for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1 (2), pp. 189 - 208.

② Perry, J. L., How Can We Improve Our Science to Generate More Usable Knowledge for Public Professional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2 (4), pp. 479 - 482.

③ Raiffa, H., *Decision Analysis*, Reading: Addison - Wesley, 1968.

④ Grimmelikhuijsen, S., "Linking Transparency, Knowledge and Citizen Trust in Government: An Experi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2 (1), pp. 50 - 73.

⑤ 网络成员主要有瑞典的奥尔胡思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中国的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和蒂尔堡大学,韩国的延世大学等。

⑥ 行为规律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源于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从行为科学的视角引入了“助推”(nudge)的概念,并掀起了将行为规律研究与政府实务工作相结合的风潮,尤其是政策的设计执行等环节。

验的方法研究大众的行为规律,来指导政府解决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欧洲助推网络(European Nudging Network)也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共同致力于在欧洲分享行为规律研究的应用的最新案例和成果,以及在政策实施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国内于十几年前开始致力于对公共政策实验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多家科研单位建立了公共管理与政策实验室,如华中科技大学电子政务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研究实验中心、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实验室/公共冲突解决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社会实验室、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政策仿真实验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模拟与仿真实验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运行与应急管理实验中心、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农业政策开放实验室等。这些机构通过对政策制定与实施、管理与决策过程进行模拟和分析,正在尝试将研究结果运用到实际的政策分析与公共治理当中。

同时,国内学界也开始了将实验法应用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探索。《公共行政评论》在2015年开辟了一个实验研究方法的专栏,呼吁在公共管理领域开展实验研究。<sup>①</sup>该专栏包括两篇实验研究论文。<sup>②</sup>马亮从方法学的角度对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中实验法应用的现状和前景做了分析,指出了准实验和自然实验在中国情境下应用的可能性。<sup>③</sup>鉴于当前国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刚刚起步,有必要对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梳理,为中国未来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供参考。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篇针对公共管理实验的方法类综述论文,对各类实验方法的使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所涉及的具体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和准实验(quasi-experiment),为研究者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供方法指导。针对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进行文献评述的论文有两篇:波兹曼(Bozeman)和斯科特(Scott)对1992年前采用实验室实验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进行了梳理。<sup>④</sup>博维曼(Bouwman)和格雷姆里克怀森(Grimmelikhuijsen)对1992~2014年的42篇实验研究文献从研究主题、研究设计、研究样本和研究外部效度等方面进行了评述。<sup>⑤</sup>表1对目前国内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综述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比较。

① 景怀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

② 周佳、景怀斌:《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余莎、耿曙、孔晏:《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

③ 马亮:《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④ Bozeman, B., P. Scott,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n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1992, (3), pp. 293-314.

⑤ Bouwman, R, S. Grimmelikhuijsen, "Experiment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1992 to 2014: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Ways Forw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1992 (2), pp. 110-131.

表 1 现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综述特点概括及其与本文的比较

| 综述来源                              | 综述的实验类型 |      |      |      |     | 综述侧重点 |      |
|-----------------------------------|---------|------|------|------|-----|-------|------|
|                                   | 实验室实验   | 调查实验 | 现场实验 | 自然实验 | 准实验 | 方法学   | 文献梳理 |
| 波兹曼和斯科特（1992 年）                   | √       |      |      |      |     | √     | √    |
| 马吉茨（2011 年）                       | √       |      | √    |      |     | √     |      |
| 布罗姆 - 汉森（Blom - Hansen）等（2015 年）  | √       | √    | √    | √    | √   | √     |      |
| 毕卡路（Baekgaard）等（2015 年）           | √       | √    | √    |      |     | √     |      |
| 安德森（Anderson）和爱德华（Edward）（2015 年） | √       |      |      |      |     | √     |      |
| 博维曼和格雷姆里克怀森（2016 年）               | √       | √    | √    | √    | √   |       | √    |
| 马亮（2015 年）                        | √       | √    | √    | √    | √   | √     |      |
| 本文                                | √       | √    | √    |      |     |       | √    |

本文拟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对当前国外公共管理截至 2016 年底的实验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借助文献计量的方法分析解当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公共管理领域开展实验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与上述两篇文献综述的不同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文献准入范围上，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的实验室实验研究、调查实验研究和现场实验研究进行评述。之所以选取这三类实验进行评述，是因为相比于自然实验和准实验，这三类实验是“真实验”（true experiment），研究者可以实现对干预的直接操控，更符合实验研究的基本思想。故与博维曼和斯科特的综述相比，本文对所评述的实验类型进行了扩展（增加了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而与博维曼和格雷姆里克怀森的综述相比，本文所评述的实验类型则进行了收缩（不包含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其次，在文献准入时间上，本文对截至 2016 年底在线数据库中可搜索到的所有上述三类实验研究进行评述。与前述两篇综述相比，本文的优势体现在：一方面，本评述的覆盖范围从在线数据库中可追溯的最早的实验研究（1978 年）至 2016 年，这将更有利于观察和发现实验研究历年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2014 ~ 2016 年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数量增长迅猛，其发表实验研究数量基本与 2014 年之前发表实验研究的总量持平（详见后面的数据分析），目前已有的截至 2014 年的文献梳理综述已不足以概括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发展现状。

二 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及筛选方法

本文所选文献的筛选过程 and 标准如图 1 和表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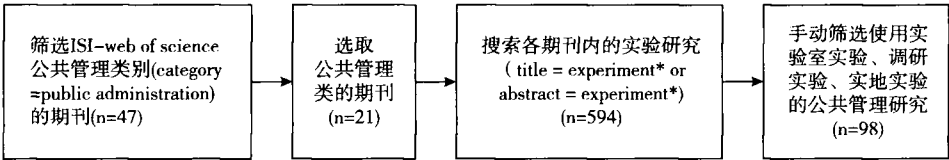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表 2 文献筛选标准

| 项 目     | 包 括 内 容         | 不 包 括 内 容        |
|---------|-----------------|------------------|
| 期 刊     | 公共管理            | 公共政策*，社会治理，非营利组织 |
| 研 究     | 公共管理实验          | 政策实验             |
| 实 验 方 法 | 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现场实验 | 自然实验、准实验         |
| 时 间     | 2016 年以前（含）     | 2017 年以后         |
| 语 言     | 英语              | 其他               |

\* 《公共政策与管理杂志》（*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虽为典型的公共政策类期刊，但由于其包含管理类研究，也被包括在被选中的公共管理期刊中。

步骤一：期刊筛选。从科技引文索引－科学网（ISI－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筛选出公共管理类的期刊，共计 47 本。从中选出全部公共管理的英文期刊，剔除所有公共政策、社会治理以及非营利组织方向的期刊，剩余共计 21 本。

步骤二：文献筛选。在筛选出的期刊中，分别以“experiment\*”作为标题（title）或摘要（abstract）的关键词进行搜索（TI = experiment\* or AB = experiment\*）；如其出版商网站数据库无高级搜索功能，则在其他文献综合数据库中进行查询。其中，有 14 本期刊在其出版商数据库进行搜索，有 5 本在亿愿（EBSCO）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有 2 本在斯高帕斯（Scopus）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各期刊的详细搜索情况参见附录。搜索的时间范围为起始时间不限，终止时间为 2016 年。在 21 本期刊中，共计搜索出 594 篇文献。

步骤三：数据清理。对 594 篇文章进行人工阅读，选出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剔除自然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政策实验研究、综述论文以及少量自称实验研究实为调查的研究，剩余共计 98 篇文章。表 3 汇总了各期刊文献筛选的情况。

表 3 各期刊文献筛选情况汇总

| 期 刊                                                              | 建刊<br>时间 | 检索范围                                                                       | 初步筛选<br>数量（篇） | 最终筛选<br>数量（篇） | 检索源及<br>问题备注                                       |
|------------------------------------------------------------------|----------|----------------------------------------------------------------------------|---------------|---------------|----------------------------------------------------|
| <i>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r/>Research and Theory</i>  | 1991 年   | 1991 ~ 2016 年                                                              | 45            | 28            | EBSCO 数据库（1997 ~<br>2016 年）人工检索<br>（1991 ~ 1996 年） |
| <i>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i>                              | 1940 年   | 1965 ~ 2016 年                                                              | 116           | 20            | 出版商*                                               |
| <i>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br/>Journal</i>               | 1998 年   | 1998 ~ 2016 年                                                              | 24            | 10            | Scopus 数据库                                         |
| <i>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br/>Management</i>             | 1981 年   | 1981 ~ 2016 年                                                              | 96            | 6             | 出版商                                                |
| <i>Public Administration</i>                                     | 1923 年   | 1923 ~ 2016 年                                                              | 53            | 6             | 出版商                                                |
| <i>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i>                               | 1972 年   | 1973 ~ 2016 年，<br>前身为 <i>Public Mana-<br/>gement</i> （1999 ~<br>2000 年）未包括 | 11            | 5             | 出版商                                                |
| <i>Public Management Review</i>                                  | 1999 年   | 2001 ~ 2016 年                                                              | 18            | 4             | EBSCO 数据库                                          |
| <i>Local Government Studies</i>                                  | 1971 年   | 1975 ~ 2016 年                                                              | 21            | 4             | EBSCO 数据库                                          |
| <i>Regulation &amp; Governance</i>                               | 2007 年   | 2007 ~ 2016 年                                                              | 19            | 4             | 出版商                                                |
| <i>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br/>istration</i>            | 1967 年   | 1967 ~ 2016 年                                                              | 15            | 2             | 出版商                                                |
| <i>Administration &amp; Society</i>                              | 1969 年   | 1969 ~ 2016 年                                                              | 14            | 2             | 出版商                                                |
| <i>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br/>ministration</i>           | 1980 年   | 1980 ~ 2016 年                                                              | 12            | 2             | 出版商                                                |
| <i>Public Performance &amp; Management<br/>Review</i>            | 1975 年   | 2000 ~ 2016 年                                                              | 7             | 2             | EBSCO 数据库                                          |
| <i>Governance</i>                                                | 1987 年   | 1988 ~ 2016 年，<br>前身为 <i>Public<br/>Money</i> （1981 ~<br>1987 年）未包括        | 15            | 1             | 出版商                                                |
| <i>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br/>trative Sciences</i>     | 1953 年   | 1957 ~ 2016 年                                                              | 11            | 1             | 出版商                                                |
| <i>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br/>Emergency Management</i> | 2004 年   | 2004 ~ 2016 年                                                              | 5             | 1             | Scopus 数据库                                         |
| <i>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br/>opment</i>               | 1947 年   | 1981 ~ 2016 年                                                              | 32            | 0             | 出版商                                                |
| <i>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br/>ministration</i>         | 1937 年   | 1937 ~ 2016 年                                                              | 31            | 0             | 出版商                                                |
| <i>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i>                            | 1958 年   | 1958 ~ 2016 年                                                              | 29            | 0             | 出版商                                                |
| <i>Public Money &amp; Management</i>                             | 1981 年   | 1988 ~ 2016 年                                                              | 18            | 0             | EBSCO 数据库                                          |
| <i>Transylvanian Review of Adminis-<br/>trative Sciences</i>     | 2005 年   | 2005 ~ 2016 年                                                              | 2             | 0             | 出版商                                                |
| 总 计                                                              |          |                                                                            | 594           | 98            |                                                    |

\* 没有选择 Jstor 数据库，虽然 Jstor 收录了 1940 年开始之后的，但是高效检索中对于摘要检索（早期的 PAR 文章没有摘要）不准确。

注：检索范围从各期刊进入在线数据库（online）后开始。

## （二）分析变量的选取

首先，将一般实验方法的基本要素确定为分析维度之一，具体包括实验研究类型（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现场实验），实验设计类型（被试间设计、被试内设计、混合设计）<sup>①</sup>以及因素设计类型（单因素设计、多因素设计）。<sup>②</sup>

其次，对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一些特征要素（包括研究对象、样本构成、被试招募方式）进行了编码：

（1）将研究对象分为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公众和一般个体。其中，一般个体是其研究话题没有涉及或者区分明显公共管理主客体特征的研究对象。

（2）研究被试样本分为学生、公众和公共管理专业人士。其中，将学生样本又进一步编码为公共管理硕士（MPA）等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和一般学生，公共管理专业人士又进一步编码为公共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

（3）被试的招募方式分为研究人员直接招募和间接招募。直接招募指研究人员不通过其他中介机构或关系自行进行被试招募。直接招募又进一步细分为学校招募和校外招募。间接招募指研究人员通过其他中介机构或者关系进行被试招募。间接招募分为两种途径：一是研究者雇用职业的第三方中介平台（如调查公司、网络调查平台）；二是通过研究者与某些机构或平台的项目合作关系。

表4汇总了以上分析维度及编码情况。对于各个分析维度，除上述分类和编码以外的数据，根据实际情况编码为“其他”或“不详”，在分析部分予以分别说明。

表4 文献分析维度及编码

| 一级维度      | 二级维度         | 编码            |       |          |
|-----------|--------------|---------------|-------|----------|
|           |              | 1             | 2     | 3        |
| D1 实验研究类型 |              | 实验室实验         | 问卷实验  | 现场实验     |
| D2 实验设计类型 |              | 被试间设计         | 被试内设计 | 混合设计     |
| D3 因素设计类型 |              | 单因素设计         | 多因素设计 |          |
| D4 研究对象   |              | 公共部门工作人员      | 公众    | 一般个体     |
| D5 被试类型   |              | 学生            | 公众    | 公共管理专业人士 |
|           | D51 学生       | 公共管理硕士等专业学位学生 | 一般学生  |          |
|           | D52 公共管理专业人士 | 公共管理人员        | 一般职员  |          |
| D6 招募方式   |              | 直接招募          | 间接招募  |          |
|           | D61 直接招募     | 学校招募          | 校外招募  |          |
|           | D62 间接招募     | 中介招募          | 合作招募  |          |

① 被试间设计是指在实验中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干预或控制条件里；被试内设计是指同一批被试会经历所有不同的干预条件；混合设计即在实验中包含两个以上的研究因素，被试在至少一个因素上被分配到不同的干预或控制条件里，在至少一个因素上经历所有不同的干预条件。

② 单因素设计是指只考察单一因素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多因素设计是指考察至少两个因素不同水平上的差异及其交互效应。

###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文献综述。定量分析主要针对前述编码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描述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典型研究案例，对当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进行定性分析，为未来中国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出建议。

## 三 分析与发现

文献分析结果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整体情况描述，包括历年文献发表情况以及作者和研究的地理分布特征；其次是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对各类实验方法和实验设计的使用现状与趋势；再次是公共管理实验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最后是日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被试使用和招募情况。<sup>①</sup> 对于后面三个部分的分析，除了各维度的使用现状和发展趋势外，同时结合典型的研究案例对其进行评述。

### （一）总体情况概述

从实验研究在各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来看（见表3），目前发表实验研究最多的期刊分别是《公共管理研究和理论杂志》、《公共管理评论》以及《国际公共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合计发表数量占到了实验研究总量的一半以上（59%）。对数据库中所有作者（共143名）的地理信息（所属机构的国别）进行分析发现，作者分布最多的前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75名，52%）、丹麦（14名，10%）和荷兰（12名，8%）；对数据库中所有研究的地理信息（开展研究的国家）进行分析<sup>②</sup>发现，累计发表量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美国（47篇，48%）、丹麦（16篇，16%）和英国（5篇，5%），另外在两个国家以上开展的跨国研究也占到一定比例（6篇，6%）。这些分析表明，不论是从作者分布还是从研究分布来看，美国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都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来自丹麦的研究。

从实验研究论文历年发表数量来看（见图2），在近40年（1978~2016年）中，1992年出现过一个小高潮，而在此之前以及之后的十几年间，实验研究寥寥无几，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从2011年起，实验研究的数量开始迅速上升（2010~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2%）。因此，在下述关于研究趋势的分析中均以2010年作为分界点，对各分析维度在2010年前后的总体状况及2010年后的增长情

① 由于存在一篇文章中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实验的情况，对于研究论文的历年发表情况以文章数为单位进行统计，其余分析除作者所在国别以外，均以实验数为单位进行统计，总计实验数为112个。

② 由于不存在一篇文章中多个实验在不同国家开展的情况，故这项分析以文章为单位进行统计。



况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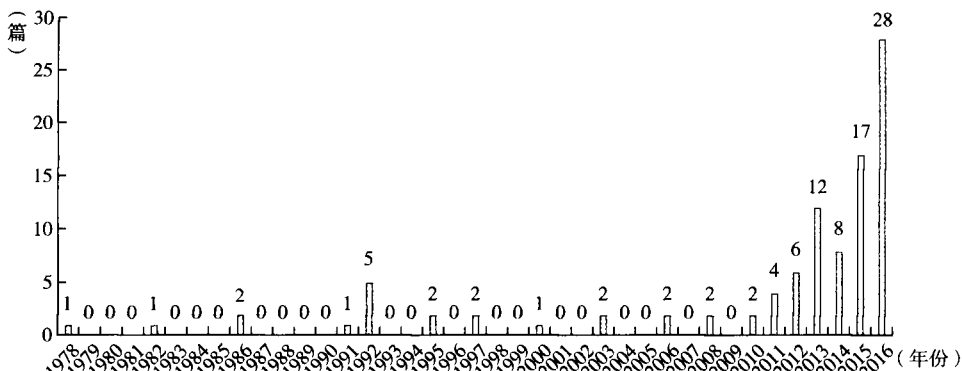


图2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论文数量趋势 (1978~2016年)

## (二) 实验方法使用分布及趋势分析

从实验研究的类型来看,使用最多的是调查实验,占到实验研究总数的一半以上(63个,占56%),其次是实验室实验(26个,占23%)和现场实验(23个,占21%)。

公共管理的调查实验在操作上与传统的问卷调研较为相似,主要区别在于调查实验中研究人员会根据实验设计对调查实施“外在的”干预。<sup>①</sup>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实验的干预条件设计不同版本的问卷,通过比较被试对于不同版本问卷的回应来得出实验结论。调查实验中最常用的是情景实验(在本综述涉及的63个调查实验研究中,有56个使用了这种方法),通常会向被试呈现一段情景描述,收集被试对于与情景相关特定研究问题的观点和态度;不同的实验条件形成不同版本的描述,为了尽可能提高不同实验条件之间的可比性,通常不同版本的描述采用的是同一个情景,变换的只是关键的实验控制因素。

例如,丹麦研究者海威德曼(Hvidman)和安德森(Andersen)在使用调查实验方法研究公众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绩效的不同态度时,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段关于某医院的情景描述,在公共部门的情景下,被试被告知这是一个公立医院,在私人部门的情景下,被试被告知这是一个私立医院,其他信息保持相同。在阅读描述后,要求被试回答与医院绩效评价相关的问题。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回答,可以得知公众在评价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绩效的观念差异。<sup>②</sup>

实验室实验通常被研究者用来探索一些偏理论性的问题。例如,爱迪生(An-

① Blom-Hansen J., R. Morton, S. Serritzlew, "Experiments in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2), pp. 151-170.

② Hvidman, U., S. C. Andersen, "Percep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 (1), pp. 111-120.

derson) 和斯特里奇 (Strich) 通过实验室实验, 研究了“目标清晰性” (goal clarity) 和“任务重要性” (task significance) 如何影响公共机构员工工作绩效的问题。<sup>①</sup> 在实验中, 被试的工作绩效通过被试在实验室的电脑上完成抄录任务来测量 (在 10 分钟内抄录越多绩效越好)。

现场实验通常与公共管理的实际工作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例如, 贝莱 (Belle) 借助于意大利一个地方健康护理机构参与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项目, 在意大利某公立医院中以护士为被试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 探讨了多个影响其工作绩效的因素。<sup>②</sup> 在这个研究中, 实验是基于健康护理机构护士的一项日常工作展开: 检查其他机构捐赠的手术工具和药物后组装成手术包, 提供给曾经遭受过战争的地区, 这成为研究其工作绩效的数据来源。

从实验研究类型的使用趋势来看 (见图 3), 调查实验研究在 2010 年后增速最快 (2010 ~ 201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71%), 相对增幅也最大 (从占三类实验研究总数的 28% 到 64%; 2010 年计入 2010 年前的统计, 下同); 其次是现场实验 (从占三类实验总数的 12% 到 23%, 2010 ~ 201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38%); 实验室实验在 2010 年后的研究总量和比例 (从占三类实验总数的 60% 到 13%) 则均出现了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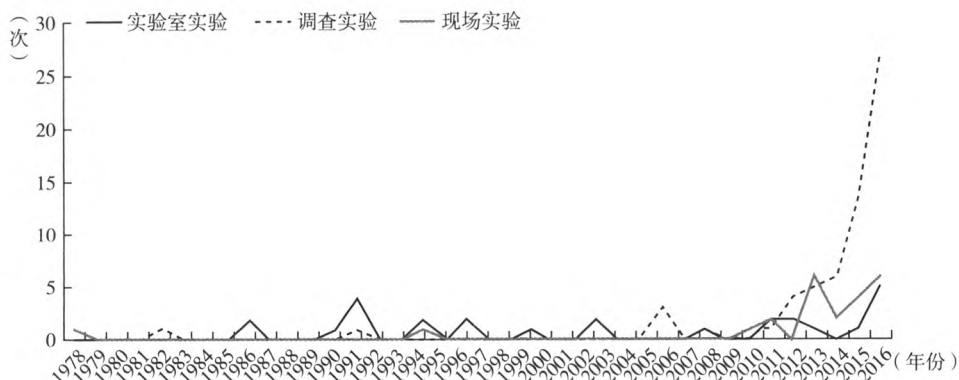


图3 实验研究类型使用趋势

从实验设计类型来看, 有九成 (102 个, 占 91%) 的实验研究用的是被试间设计, 极少量研究 (2 篇, 占 2%) 采用的是被试内设计, 少量研究 (8 篇, 占 7%) 采用了混合设计。从实验设计的使用趋势来看 (见图 4), 被试间设计的使用在 2010 年后有了较大飞跃 (使用比例从占三类设计的 76% 增长到 95%, 2010 ~ 201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79%), 被试内设计和混合设计的使用在 2010 年后则没有呈现出

① Anderson, D. M., J. M. Strich, "Goal Clarity, Task Significance,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016 (2), pp. 211 - 225.

② Bell, 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 (1), pp. 143 - 153.

增长的趋势,并且由于被试间设计数量迅速增加,其使用比例有大幅下降(从合计占24%下降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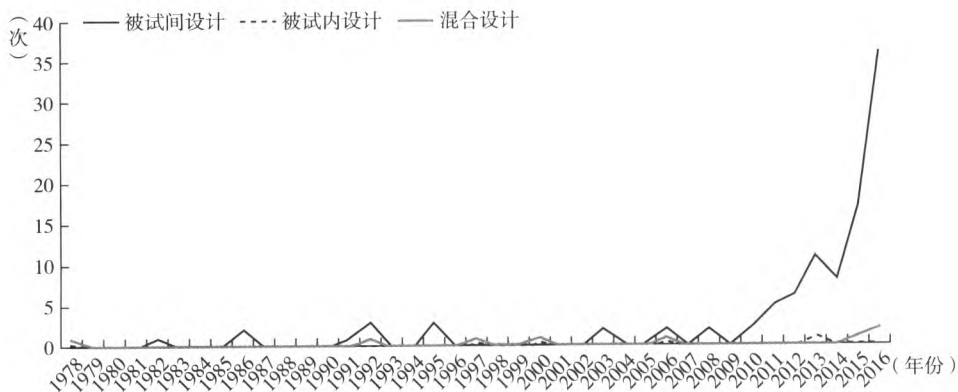


图4 实验设计使用趋势

被试间设计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多个干预条件进行检验,具有较高的时间效率,适用于各个干预条件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上述海威德曼和安德森关于政府部门绩效差异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被试间设计,由于不同实验条件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医院被赋予的属性,这种情况如果采用被试内设计,会对被试的判断造成一定的干扰,无法得到理想的实验结果。

被试内设计的优势是易于消除被试自身差异带来的偏差,同时由于不同的干预条件全部由同一组被试完成,对被试数量的要求相对较少。如果实验条件之间不存在相互干扰的情况,采用被试内设计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例如,在一篇研究员工绩效评价的文章中,研究者通过进行“ $2 \times 2 \times 2$ ”被试内设计,考察了员工在工作绩效、帮助行为和组织忠诚度上的不同表现(高 vs. 低)如何影响上级对其工作表现的评价,针对8个条件设计了8个行政助理形象,每个助理有3段分别关于其工作表现、帮助行为和组织忠诚度的描述,每位被试都阅读了8位行政助理的描述并对其进行评价。<sup>①</sup>

混合设计是灵活处理被试内设计和被试间设计的一种方式,通常可以集两者的优势于一身。例如,格罗斯(Grohs)等研究者通过向德国市政厅发送服务请求的邮件,研究了德国的公共服务中是否存在种族和性别歧视。<sup>②</sup>通过使用“ $2 \times 2 \times 2$ ”混合设计分别控制了种族、性别和服务需求三个因素,其中种族(德裔 vs. 土耳其裔)和性别(男 vs. 女)是两个被试间因素,通过姓名特征来操控,服务需求(儿

① Christensen R. K., Whiting S. W., et al.,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Task, and Non-task Behavior: A Performance Appraisal Experiment with Korean MPA and MBA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1), pp. 28-52.

② Grohs S., Asamc, Knill C., “Are Some Citizens More Equal than Other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 (1), pp. 155-164.

童照护 vs. 活动住房) 是一个被试内因素, 通过实验设计形成的 8 个条件分配给 4 个市政厅, 每个市政厅接收两类服务请求。这比单独使用被试间设计提高了研究效率。

从实验设计类型的另一个维度 (单因素设计 vs. 多因素设计) 来看, 有六成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采用的是单因素设计 (68 个, 占 61%), 约有 1/3 的研究采用的是多因素设计 (38 个, 占 34%), 还有约 5% 设计类型不明确的情况。单因素研究设计最常用的是两水平单因素设计 (约占总单因素设计总量的 44%, 最典型的例子是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的比较), 例如, 卡伦斯 (Karens) 等研究者研究了公共部门的品牌创建对于公民对公共政策信任度的影响, 采取的是典型的单因素两水平设计, 两组被试分别阅读标有联合国标识的政策和没有标有联合国标识的政策。<sup>①</sup> 多因素研究设计最常用的是两因素设计 (约占多因素设计总量的 53%)。例如, 上述海威德曼和安德森关于公司部门绩效差异的研究采用的就是 “2 × 2” 多因素设计, 除了医院的公立、私立属性这个因素外, 还包括了医院是否使用了绩效管理这个因素。

图 5 展示了单因素设计和多因素设计的总体使用趋势。2010 年之前的实验研究对多因素设计的使用在数量上略高于单因素设计 (占比分别为 56% 和 44%), 2010 年之后使用单因素设计和多因素设计的实验研究绝对数量都出现增长, 并且单因素设计的增长率 (2010 ~ 201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69%) 大于多因素设计 (2010 ~ 201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4%), 使得 2010 年后单因素设计的使用比例超过了多因素设计 (占比分别为 66% 和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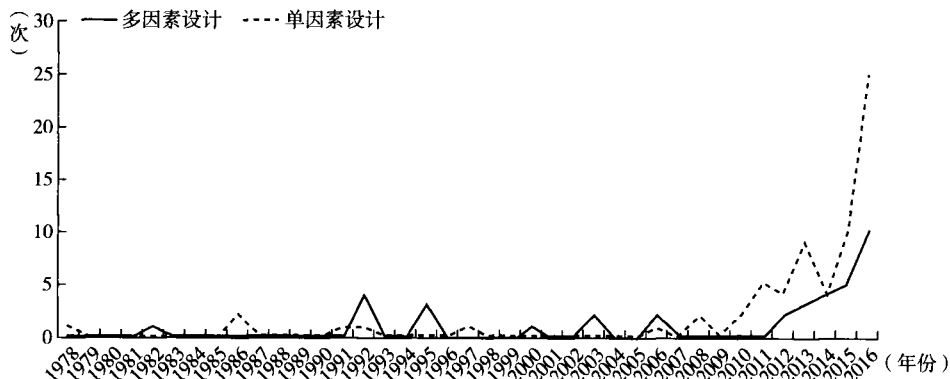


图 5 实验因素设计使用趋势

### (三) 研究对象和话题分析

通过对实验的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发现, 以公众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占到将近一

<sup>①</sup> Karens, R., J. Eshuis, E. H. Klijn, et al., "The Impact of Public Brand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Branding Policy on Citizen Trus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 (3), pp. 486 - 494.

半(49%),以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约占到四成(42%),还有部分实验的研究话题没有提及或涉及具体的研究对象,它们只是针对“一般个体”展开,如早期探讨决策机制的研究,这部分研究不到一成(7%);另外还有极个别方法论的研究(2%)。

对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见图6),2010年前针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研究最多(68%),其次是针对公众和一般个体的研究(各占16%);2010年后,针对公众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研究都有增长,并且公众研究的增长率(2010~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6%)大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研究的增长率(2010~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3%),使得针对公众研究的总量超过了针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研究(分别占比59%和36%);针对一般个体的研究在绝对数量上没有变化,但相对占比有所下降(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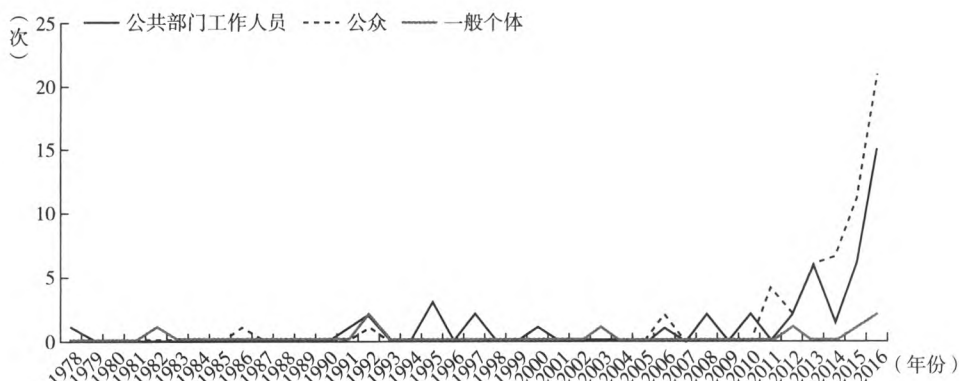


图6 实验的各类研究对象使用趋势

表5分别对上述三类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对象涉及的研究话题进行了归纳,其中围绕公众和公共部门两个主体展开的研究是目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主要内容。对公众的研究主要关注公众对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的认知(还可以进一步从公众的感知、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进行分类),与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传统实验研究的应用领域对公众的关注一脉相承,也与马吉茨所建议的关注公众—政府交互关系以及公众对政府的感知等领域相一致。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格雷姆里克怀森与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研究探讨了政府透明度对公众信任度的影响。<sup>①</sup>

对公共部门的研究主要探索公共部门个人和组织层面的运作和行为规律,其中绩效和决策是两个核心议题。例如,上文提到的贝莱以意大利某公立医院的护士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多个影响护士工作绩效的因素,包括公共服务动机、自我说服干

① Grimmelikhuijsen, S., G. Porumbescu, B. Hong, et al.,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cy on Trust in Government: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 (4), pp. 575 - 586; S. Grimmelikhuijsen, A. Klijn, "The Effects of Judicial Transparency on Public Trus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4), pp. 995 - 1011.

预、变革型领导力、社会影响感知等。阿弗兰达（Avellaneda）以预算决策为背景，研究了120名拉丁美洲的市长决策，研究了决策问题的严重性、决策背景的压力以及决策选择限制对市长决策的影响。<sup>①</sup>

表 5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对象及话题

| 研究对象       |    | 话 题               |
|------------|----|-------------------|
| 公众         | 感知 | 绩效、决策合理性、机构合法性等   |
|            | 态度 | 信任、满意度、责备、支持度、期待等 |
|            | 行为 | 公共参与、公共协作、决策等     |
| 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 —  | 决策、绩效、组织行为等       |
| 一般个体       | —  | 决策机制、公共服务动机、方法论等  |

（四）研究被试分析

从被试的构成来看，目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最常见的被试是公众，使用公众作为被试的实验占到实验总数的一半（50%）；其次是学生被试，约占三成（29%），学生被试中公共管理硕士等有专业背景的学生约占1/5（22%），其余是一般学生被试（78%）；相对较少的是专业人士作为被试的实验，占两成（20%），其中政客、官员、公共管理者等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各占一半；还有少量研究被试情况不详（1%）。

如图7所示，对被试的使用趋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10年前的实验研究中使用学生被试的研究最多，占到三类被试中的一半，其次是专业人士和公众，分别占29%和21%；2010年后增长最快的被试群体是公众（2010~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7%），其次是学生被试和专业人士被试（2010~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和35%），使得公众被试的使用比例成为最高（59%），学生和专业人士被试的使用比例均有所下降（分别为23%和18%）。

被试的招募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研究者自己直接招募（38%）和借助于其他平台（或机会）间接招募（49%），此外还有约13%的实验被试招募方式不详。在直接招募被试的实验中，有近2/3是在学校内进行招募，这种招募方式主要针对学生群体。例如，上述格雷姆里克怀森等研究者关于公众对政府信任的研究、爱迪生和斯特里奇关于公共机构员工绩效的研究；另外约1/3的研究则是通过电话、信件、邮件、拜访等方式在校外进行，主要的招募对象是公众和专业人士。例如，前文提到的格罗斯等人关于德国公共服务是否存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研究是通过发送邮件的

① Avellaneda, C. N., “Mayoral Decision – Making: Issue Salience, Decision Context, and Choice Constraint? An Experimental Study with 120 Latin American Mayor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012 (3), pp. 631 –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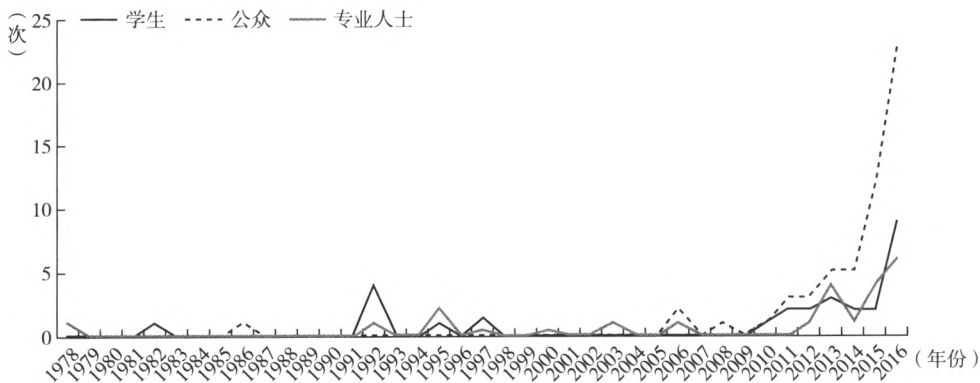


图 7 被试样本的使用趋势

方式展开的。间接招募被试的研究中大约有 2/3 是借助于第三方中介平台（包括专业的调研公司、学校和政府的网络研究平台以及以亚马逊 M-Turk 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展开的，这种招募方式最主要用于公众招募。另外，有约 1/3 是通过项目等合作关系进行招募，主要用于专业人士和公众招募。

如图 8 所示，2010 年之前研究者在校内和校外直接招募是主要的被试招募方式（分别占 75% 和 17%），2010 年后间接招募方式成为主要的被试招募方式（中介招募和合作招募分别占四类招募方式中的 40% 和 22%）。其间，通过中介进行招募的方式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57%；学校招募、校外招募和合作招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4%、20% 和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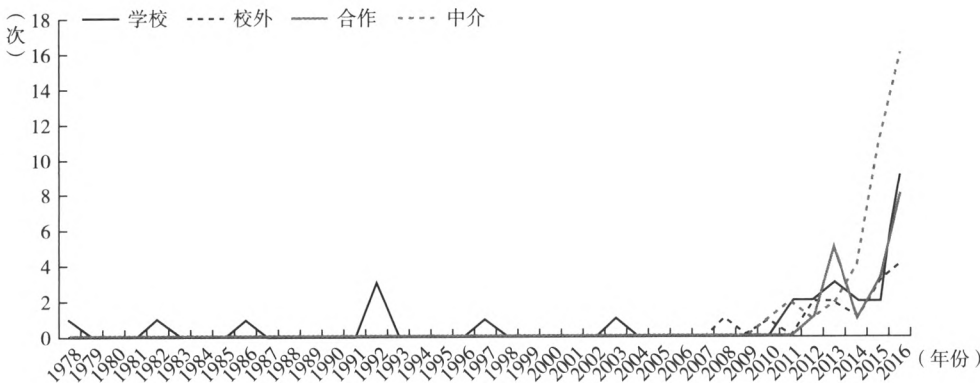


图 8 被试招募方式发展趋势

### 四 讨论与建议

以上我们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对目前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下面我们将结合上述主要发现进行进一步讨论，并就未来中国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提出一些管窥之见。

##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总体分析

总体而言，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验研究从 2011 年起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实验研究的倡导者的呼吁以及《公共管理评论》、《公共管理研究和理论杂志》以及《国际公共管理杂志》等重要期刊相继组织实验研究专刊所做的大力推动。在当前实验研究的这股热潮下，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及时介入，既可以加入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对于实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当中，也可以探索实验方法对于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适用性，对于开展国际对话与建立中国特色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根据前述分析可知，美国和丹麦在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面较为领先，典型的研究者有美国的格雷格·范·里津（Gregg Van Ryzin）和丹麦的西蒙·卡尔玛·安德森（Simon Calmar Andersen），他们个人参与的实验研究论文分别达到 9 篇和 5 篇。值得注意的是，丹麦作为实验研究的后起之秀，其人均发表量甚至超过了美国。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丹麦的实验研究以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为主，且常常通过与公共部门合作的方式展开，这对中国未来开展实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公共部门与高校等科研机构的项目合作由来已久且日益密切，恰当地利用这些合作关系可为研究者提供实验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被试的支持，研究结果也具有更强的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便于更为有效地转化到实务应用领域。

## （二）实验方法和设计

目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调查实验，其次是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调查实验对研究环境的要求比较简单，与传统的问卷调研在实际操作上最为相近，实施起来相对容易，且随着网络调研平台的兴起，为调查实验收集数据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方式。这些特点使得调查实验成为目前最受青睐的实验方法。相比之下，实验室实验通常在实验设计和操作环境上有较严格的控制，同时由于实验室实验与现实情景有一定的差距，也使得一部分公共管理研究者仍然对它持保守态度，因此目前使用实验室实验的研究显著少于调查实验。现场实验是将实验室实验置于真实的情景下进行，克服了实验室实验真实性较低的问题，但由于在现实情景下允许给予“外在”干预的情况非常有限，因此现场实验的使用也仍然相对有限。

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对于各种实验方法的使用，可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类方法的优势（如开展调查实验可以借助于网络平台高效回收数据），另一方面积极克服各类方法的劣势。例如，现场实验可通过与公共部门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来展开，实验室实验可通过高仿真的情景模拟展开。同时，还可以通过结合不同的实验方法来弥补彼此的劣势，以进一步夯实研究结论。

目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对于采用单因素设计和被试间设计有较强的偏好。单因素设计的优点在于简明清晰，可清楚地观察到各实验条件之间的差异，却无法同



时观察到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于现实中某一因变量通常会受到多个因素（自变量）的影响，使用多因素设计可以尽可能反映和控制这些自变量，使实验研究得到更具鲁棒性的结论。被试间设计的优势在于操作较为简易，与被试内设计相比无须考虑实验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如果各实验条件之间不存在影响，使用被试内设计则可带来更高的内部效度。在中国未来开展的实验研究中，可适当加强多因素实验设计的使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强被试内设计和混合设计的使用。

### （三）研究对象和被试使用

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是目前公共管理研究的两大类主体，未来中国的实验研究也可以围绕这两类主体展开。对于公众的研究可从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公共部门、公共政策等的主观感知、态度和行为几个方面展开，这部分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研究可以结合中国公共管理的实务展开，也可以从绩效和决策等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已经涉及的主题入手，对比中外差异。另外，中国各级行政学院、党校以及高校的领导干部培训班为研究中高层公共部门管理人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在中国未来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也可以加强对这个群体的研究，以加深对其行为规律的理解。

目前参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主要被试群体是公众，其次是学生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对比实验研究对象和被试群体可以发现，尽管以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数量相差不多，但在针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公众或者学生作为被试参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试群体的可得性所决定的。由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职业特性，用其他被试群体代替可能会导致研究其行为特征时产生一定偏差。与前述建议相承，在中国未来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可加大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力度，尽可能获取真实被试群体，这对于准确了解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群体特征和组织特征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学生被试的使用。在以学生为被试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一部分是针对公众的研究，另一部分是针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研究。学生被试被广泛应用于传统的实验研究领域（如心理学研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可得性和便利性，另一原因是这些领域的实验研究所探索的是一般性的因果关系或规律，如人类的认知模式，或大众的行为规律。其背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学生的表现可以代表一般大众。因此，学生被试更适合于对于公共管理研究中理论问题的探索。例如，一项研究政府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关系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被试，同时作者在其方法论说明中强调，该研究并非旨在从统计上推广至一般人群，而是重在从中概括出透明度与信任之间的理论上的关系。<sup>①</sup> 另外，鉴于招募公共管理专业人士参与实

<sup>①</sup> Grimmelikhuijsen, S., G. Porumbescu, B. Hong, et al.,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cy on Trust in Government: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 (4), pp. 575 - 586.

验研究的难度,使用公共管理硕士已成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替代方式。在中国未来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可合理、灵活地使用学生样本(包括公共管理硕士生)来研究相应的问题。

在被试招募方式上,目前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有直接招募和间接招募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后者在研究发展后期占到了较大比例。间接招募中通过第三方中介平台招募被试是主要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类似于 M-turk 这样的网络平台招募被试成为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可充分利用这些网络平台之便利性的优势,在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实验研究的效率。

## 五 结语与展望

国外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正在迅速崛起,这些研究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实证证据。希望未来国内有更多的研究者可以加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队伍,充分发挥实验法的优势来研究和解决中国公共管理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除了目前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涉及的主题和研究方法,中国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还可以尝试创新的实验方法来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问题。例如,在实务领域,在中国当前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下,对于新的管理方式的评估,可以通过综合不同的实验方法和技术(如高仿真模拟<sup>①</sup>、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信息使用<sup>②</sup>、可视化决策支持平台<sup>③</sup>、基于真实人群博弈和专业化综合集成支持的公共政策实验<sup>④</sup>等)来取代以往小范围实地试验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和社会风险成本;在理论研究领域,可以通过实验法研究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如晋升机制、党政关系模式)对官员行为(如决策行为、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学界与政府所具有的密切合作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政府对创新管理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迫切需求,针对一些较为深层次的问题(如党政关系问题、决策的深层心理机制等问题),或具有中国特点的治理问题(如全民参与、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sup>⑤</sup>等),利用实验方法的独特优势开展比较深入

- 
- ① 李天宇、米加宁、徐磊:《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原理,应用与前景》,《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4期。
  - ② Lanz, Scott C. R.,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uter-mediated Information versus Conventional Non-Computer-mediated Information in Public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 pp. 27-37.
  - ③ 郝晨健、张文字:《可视化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郝晨健、张文字:《华中科技大学电子决策剧场》,《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9期。
  - ④ 李亚:《利益博弈政策实验方法:理论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46页。
  - ⑤ 宋学增、蓝志勇:《社会管制的全民共建共享机制: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2期。

的探讨。这些具有中国独特优势或特点的研究方向,有可能对中国学者在公共政策与管理实验领域做出独特贡献提供更多的机会。

最后,公共管理学者不仅需要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现有范式和方法有一个全景式的和自觉的意识,从而对新的、异常现象保持敏锐,去重构和发展新的理论<sup>①</sup>;同时,公共管理学者还需加强与心理学等实验学科的合作与对话,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共同促进和不断深化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内各类群体的行为规律的理解和认识。

##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oreign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oqian Li, Xiaoli Lü, Hao Xu and Qiushi Liu

**Abstract:** The number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foreign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uch experimental studies, using lab experiments, survey experiments, or field experiment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SSCI-indexed PA journals up to 2016. Specifically, these studies include descriptive and longitudinal analyses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 experimental designs, object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until now survey experiments have been the most popular experimental methods; researcher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use a single factor design or between-subject design more often than other experimental design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professionals, while the general public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experiment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perimental Studies; Review; Bibliometric Analysis

① 蓝志勇:《全景式综合理性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2期; Lan, Z., K. K. Anders, "A Paradigmatic View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 Empirical Test,"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0 (2), pp. 138 - 165。